我当红军连队政治委员

■方 强

星火燎原 撷英 7

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辛探索和不懈努力，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解决了如何克服党内和军队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把红军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这一根本性问题。本文作者方强时任红3军团第7团第11连政治委员（红军中连的政治委员1930年后改称政治指导员），该连连长是个旧军人，连队大部分官兵是“被迫投降的敌兵”和连长收来的散兵游民；连队党组织不健全，政治工作不落实，旧军队习气严重。本文记述了方强到任后，通过一系列艰辛努力，建立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重新改编班排，广泛实行民主制度，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等，成功将连队改造成为人民军队的实践过程，反映了贯彻人民军队建军原则，特别是落实古田会议决议精神的必要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一九三〇年夏季的一个大热天，烈日如火。

我戴一顶写着“革命成功”四个大字的草帽，光脚板在晒得发烫的青石板街道上快步走着。手中握着一卷沉甸甸的文件：这里有我的介绍信，有红军一个连队的党员名单，有油印的《怎样做支部工作》《士兵委员会组织章程》《早晚点名口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石印的《党十大政纲》《土地法》《劳动法》；还有中国共产党三军团前委和军团政治部告士兵书、告群众书……这些红军政治工作的文件，就是我当时的“武器”。

长寿街解放后，我在长寿街市苏维埃政府担任裁判委员兼财政委员，并做党团书记的工作。前些日子，党的湘鄂赣特委李宗白同志，召集长寿区的七个地方共产党员谈话说：“红军扩大得很快，需要党员去做政治工作，现在特委决定你们去三军团做连政治委员。”我没有在主力红军工作过，又听说七团是个新组成的不巩固的部队，大部分战士是打长沙后参加的，就更感到工作的艰难。但是革命形势不断地发展，红军不断地胜利与壮大，使我心里充满对党的力量的确信，又鼓励着我去担任这个新的工作。

在长寿街复生茶叶铺里，找到了七团十一连连部。传令兵推开门，只见满屋烟雾腾腾，桌上杯盘狼藉。正中坐着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左腮帮上有一块红而发亮的伤疤；两旁大腿架小腿地散坐着几个人。传令兵告诉我中间那个人就是连长。

连长看完介绍信，动也不动，把我上下打量了一阵，轻蔑地歪歪脑袋、撇撇嘴，半天才用那破竹似的声音问我：“你当过兵没有？”我说：“没有当过白军，只当过红军游击队。”他想了想，又眯缝起眼睛问道：“你多大年岁了？出过门没有？嗯？”他故意把声音放得轻飘飘的，好像在逗一个小孩子。我知道他看不起我，但还是忍着气，老老实实地回答他：“没有出过门，今年十九岁。”他向旁边的那些人挤挤眼睛，他们看着我“咯咯”地笑起来。我觉得这个连长不大像红军，不大像革命的。他的态度使我心里有些冒火，但我还是装得不在乎。这时候，连长顺手拖来一张凳子，手一指说：“坐吧，连政治委员！”

我端端正正地坐下，拒绝了他递过来的酒杯。等他们吃完饭，喝了一会儿茶后，我说：“请连长把连里的情况给我做个介绍吧。”

他瞪了我一眼，又困惑地看了看四周的人，开始回答我的话。他忽然变得口吃起来：“嗯，是这样，连里一共九……九十多人，三个排，这是一排长、二排长。”他指指坐在旁边的两个带醉意的人，“……唔，对了，三排长今天值星不在这里。还有个司务长……共七十多支枪；还有，每天都出操。”他停了半天，猛吸着烟，似乎再也想不出什么来了。忽然，他竖起眉毛喊道：“传令兵，带政治委员找值星排长！”转过脸对我说，“详细的情况，由值星排长跟你谈吧。”

从连队里的共产党员和战士口中，我开始摸清了这个连队的具体情况。连长张有发，是个旧军人。不久以前红军第一次打下长沙后，他带了七八十个人来当红军的，其中除少数是参军来的长沙工人和城郊农民外，大部分是被迫投降的敌兵和他收来的散兵游民。当时，组织上来不及审查，他就这样当上了连长。他把拉来的人编成了一、二两个排，派自己的亲信当排长。军团政治部为了加强改造和巩固这个新成立的第七团，在长寿街曾给各连补充了苏区参军的农民，而张连长却把苏区来的战士单独编成第三排，连里仅有的七名共产党员，都在第三排中。有阶级觉悟的战士，都向我说：“连长结了小团体。”

当晚，我就在三排里和战士们一起睡，因为连部没有我的位置，同时我知道这个排是连里最可靠的部分，工作首先要依靠他们来做。这时，我了解到许多战士最不满意的事，就是连里伙食账目不公开。那时，红军的伙食钱都是按十天或一个月发下来，银圆用米袋装着，由连长背；每月由士兵委员会的经济委员算账，向全连公布，将节余的“伙食尾子”平分给战士、干部零用，这就是红军的经济民主。而十一连呢，月底见不到账目，又不见“伙食尾子”发下来，战士们饭食不好，连长和他的几个亲信却天天到菜馆里去吃喝，这能不引起大家怀疑连长贪污吗？

我觉得这是个问题。第三天，我到连长的屋里谈建立士兵委员会的工作后，坦率地对他说：“连长！战士们对你有些反映，说连里经济不公开……”他不等我说完，马上就跳起来吼道：“什么？什么……值星排长！吹哨子集合，全连站队！”他返身从屋里拿出账簿来，“噌噌噌”三步跨到队伍前，破口大骂一通，然后将账簿往地上一摔，嚷道：“你们算吧！”怒气冲冲地就走了。我注意战士们的神色，看见昨天在我面前说“连长是好人”的长沙来的刘玉海，正目瞪口呆地看着我，大部分的战士露出怒容，有几个人心灰意冷地望着那本账簿。全场的空气一时僵住了。这时，我觉得很难办，想了一下，拾起地上的账簿，对大家说：“同志们提的意见是对的，应该算伙食账，红军的经济是公开的。连长态度不好，以后再说。现在解散。回去后，每班推举出一个代表来算账！”我的话使局势改变了，有些战士就喊叫起来：“对，账还是要算，怕什么？怕就不干革命！革命讲平等。”他们实际的意思是说红军官兵平等，红军经济公开。也有些战士仍露出犹疑的神情。值星排长喊了解散的口令，战士们还围在原地“叽叽喳喳”地议论。

当时，我在战士们面前表现平静，其实心也是悬在半空。那时我还是一个十分稚嫩的没有工作经验的青年，我时常想着连长会拉拢他的“小集团”打击革命，有些害怕，有些发愁，怕完不成党交给的任务。但我一想到有党员，有苏区来的战士，想到长沙来的战士大部分是工农出身，是革命的，想到师政治委员的指示，我就有了勇气。特别是刚才战士们的态度，大大地鼓励了我，使我大胆起来。我虽然还不十分清楚地认识支部是连队的堡垒，是连队的核心，但过去的一段工作经历，使我多少懂得只有党的组织是最有力量的。我就决定首先组织支部，组织士兵委员会，在战士中进行政治教育。

那时，党的基层组织在红军中还是秘密的。我们在一个僻静的小屋里，秘密举行了连的第一次党员大会，连我在内共八名党员，选出了三个支部委员，连政治委员是当时的支部书记。按照师政治委员的指示，在会上讨论了以下事情：一是提高革命警惕性，防止反革命分子组织叛变；二是成立士兵委员会，从清算伙食账做起；三是团结教育从长沙来的新战士；四是重新改编班排，从组织上破坏“小集团”。大家发言很积极，根据大家的意见作了决议。这次会议后，党在连里有了组织，有了领导，有了工作目标，党员更加活跃起来了。

当时，红军处在初建时期，政治工作不健全、不完备，但革命军队的基本制度已经建立起来了。古田会议决议，那时我虽未读到，但决议的精神已经传达下来，而且都按照这个决议执行了。从开支部大会的第二天起，我开始每天给战士们讲话或上政治课。那时我还不懂得更多的道理，根据师政治部发的文件，多少可以讲一点点。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对革命道理很容易懂，也愿意接受，很愿意听。

连长偶尔跑来听听，搬一张凳子坐在队伍的侧面晃着小腿，听不一会儿，耐不住性子就走了，以后就再也不来了。有时我在上政治课，他却突然吹哨子叫大家出操或者擦枪。对于他这些故意捣乱的做法，我暂时忍耐着。

士兵委员会很快就组织起来了，选出邓丰同志为主席，他是共产党员，原来是毛湾乡农民协会的干部，入伍后当班长，是个很踏实老成的中年人。委员中选了三个长沙参军的新战士，这些新战士虽然还不习惯红军的民主生活，但来到红军和苏区后所见所闻，受到连里苏区战士的影响，特别是这些日子连里政治气氛也有了变化，都使他们觉得新鲜，怀着极大的兴趣来参加开会、选举等活动。至于士兵委员会有没有像我说的那么大的权力，他们还是抱着怀疑的态度。

他们的怀疑，不久就完全打消了。士兵委员会成立的第二天，伙食账已经算了出来。我便和连长商量，召开全连士兵大会，讨论算账结果，他不得不同意。经济委员宣布伙食账上亏空了三十多块钱，要大家讨论。许多战士积极发言，有的说这是经济手续不清，有的直接地说这是贪污。发言的也有长沙来的战士。经济委员问大家：“要不要赔？”战士们齐声喊：“要赔！”连长嚯地跳起来，脸色涨得像猪肝，大喊大叫：“什么？说我拿了三十多块钱？吓！”他喊着，环视全场，寻找同情的眼光，可是，他的亲信这时却无可奈何地一个个把头低下，谁也不敢讲话。连长泄了劲，嚷道：“在这个地方，你们拿吧！老子有的是钱，再多点也不在乎！”说着，掏出一把银圆摔在桌子上，怒气冲冲地走了。还没有等他走出门，屋里就有人笑出声来。我刚想制止，一看，原来就是四班长刘玉海，过去他和连长一伙的。我有点奇怪，但一想，又觉得不奇怪了。我觉察到这个战士开始觉醒，于是故意不去制止他。他一引头，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从长沙来的和从苏区来的战士们，笑声融合在一起。只有连长的两个心腹排长，惶恐地低下头，党员们则用迷惑的眼光看着我。我说：“让他们笑吧，这就是教育，这就是觉醒。”等大家笑得差不多了，我才摆摆手宣布说：“现在，就把‘伙食尾子’分给大家做零用钱。”这一次，每个战士都分到了一点零用钱。战士们从自己的行动中认识到自己的力量。

连队在算伙食账后，又加上整个红军的政治影响，连队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战士们觉得政治工作不是讲空话，心里有底了。首先是刘玉海主动找我，把连长“小集团”的底细都跟我谈了。原来连长是利用“洪帮”的封建组织，拉拢了一、二排的班排长和少数兵痞、游民，他们平时互相称呼“老哥老弟”，叫连长为“大哥”，讲的是一套黑话。我把刘玉海鼓励了一番，说他有革命思想，说长沙来的许多战士都有革命思想，说他们是穷苦工农出身，过去是受压迫的，他很高兴。经过党员的带动，苏区来的战士都特别注意团结、争取长沙来的战士：好地方让给他们睡，出公差给他们留饭，帮助他们打草鞋，给病人送饭送水，找他们个别谈话，借钱给他们往家里寄。这些行动，在当时虽然不是那么有组织的、普遍的，但长沙来的战士们都因此从感情上和苏区来的战士更亲近了，有什么话都和共产党员讲，有些人常常找我谈天。

时机成熟了，我便向连长提出了重新编班的问题。他立刻惊慌起来，腮上的伤疤忽然发红了，眼光在我身上瞟了一下，背转脸叫道：“已经编好了，为什么还要编？”“苏区来的战士有的没有打过仗，我们马上要出发第二次打长沙了。混编以后，老兵带新兵，就能打好仗。”我从容地说明着理由。“不必要，不必要。在操场上就能学嘛！”他又嚷叫起来。

我没有和他争论下去，到外边召开了支部委员会，讨论了办法。支委分头向党员进行了传达，分配他们在战士中，特别是向长沙来的战士进行解释，然后又把这个问题提到士兵委员会讨论，得到士兵委员会的全力支持。条件完全成熟了，就在这天夜晚，召开了全连的士兵大会，讨论编班问题。连长一听说开大会，头皮就发麻了，闷头坐在一条凳子上，一声也不响。

士兵委员会主席邓丰同志宣布了士兵委员会的提议，请大家讨论。这时，连长抬起头来，在人群中搜寻着，对一排长歪歪嘴，向二排长瞪瞪眼，又看看其余从长沙来的战士们，可是他们都低下头来，看样子连长和他们已经串通好了，但他却没有想到红军的民主力量。张连长没奈何，自己站起来说：“已经编好了，现在再编散，大家不熟悉，不好管理。”他的声音虽然粗大，却没有吓倒战士们。话音刚落，战士们就一个接一个地起来反驳他。刘玉海和另外几个长沙来的战士，也发言反对连长的意见。士兵大会一致通过了改编的决议。士兵委员会的权力很大，决议谁敢不执行？这样一来，连长再没有敢说什么。战士们从这次大会中又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认识到士兵委员会的民主权力确实是很大的。

支部把党员和苏区来的战士，编到每一个班里。编班以后，工作就更加顺利地展开了，支部发展了五个新党员，党的力量增强了。在党员的团结、争取下，长沙来的先进战士们更积极地向我们靠拢，许多人主动找我汇报情况。

在长寿街驻了将近一个月，部队得到命令向长沙进发，第二次打长沙。这时连长等几个人，还是每天喝酒，有时还偷偷找暗娼。

连长本来对派政治委员就很不欢迎，加上清算伙食账、成立士兵委员会、重新改编班排，就更加不满了。他表面上对我客气得多，却把气发在战士身上，打人骂人更加厉害。一天，他无理地打了一个老百姓，被我制止了，他嘀咕着说：“当心，我们在战场上见！”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第四天，部队到达长沙的外围，会合了一军团的部队。长沙的敌人这次早做好了一切防御的准备：兵力增加很多，城四周都筑了坚固的工事，工事外围是一层又一层的铁丝网、地雷、地刺和绊足网。红军在初建时期，部队没有攻坚作战的经验，装备也差，想要在人数大于我、工事坚固、火力强大的敌人面前强攻硬碰，进行军事冒险，失败是可以想见的。我们便用火牛开辟冲锋道路，连续进攻了两次都失败了。一天下午，又接到第三次进攻的命令，连长和我从团部里领受任务回来后，就立刻找向导，准备夜间进攻。

向导找来了，是个小商人模样的人。连长一见，就满脸堆笑地说：“老兄，你来你来！”把他带到远远的一棵树下攀谈起来。这些天来，行军、宿营、作战，我都紧跟着连长，防止有变，而他常常一转眼就不见了，再找到他时，总见他和人嘀咕，看样子正商量着什么。他向来对老百姓像凶神一样，今天怎么这样和气？这不能不引起我的疑惑。

本来，这天早晨就有个战士悄悄对我说：“昨晚看见连长和两个排长在野外的坟边上谈了半夜，不知说些什么。”我又回想到刘玉海说过的话：“要当心，连长不是真心干红军的。”莫不是他们想趁打长沙时叛变？我越想越觉得可疑，就立刻向师政治委员汇报了（当时团里没有政委）。师政委嘱咐我要特别提高警惕，防止叛变。

没有隔多久，邓丰同志就来找我说：“政委，今天连长写了一封信给一个老百姓送进城去了，给信时，让七班长看见了。连长那时就大声对老百姓说，这是我的家信，你务必送到。”我点了点头没说话。

晚上九点钟，部队由东山、猴石向前运动。天很黑，偏偏又下大雨，浑身淋得透湿，脚像踩在一条蛇身上，滑得很，好多人摔了跤。走了大约两个多钟头，前面部队就和敌人打响了，机枪声、炮声越响越激烈。城内的灯光、炮火的闪光和悬在半空的照明弹，把敌人的工事和障碍物都衬托出来，更显得狰狞丑恶。按照红军的惯例，连长走在前，我在后，以行军队形向前运动。我是第一次参加这样大的战斗，没有什么经验。忽然队伍停住了，起初，我以为前面遇到什么走不通，等了好一会儿还不走，三排长建议我到队伍前面去看看。我找到连长。“连长，怎么不走？”我问道。“和前面的队伍失掉联络，不知道该向哪里走。”“向导呢？”他不回答我，却大声骂起来：“这么黑，又下这么大雨，前边队伍走哪儿去了？咳！”

已经是后半夜一点多钟了，前面部队正打得激烈，可是我们却掉在这里，这怎么行？我要连长派出几个战士向前去看看，等呀等呀，那几个战士却像投向水中的石子，再也浮不起来了。我就说：“向打枪的方向走吧！”连长把头摇得像货郎鼓似的，一个劲说：“不能不能不能，天这么黑，向哪里去呢？把队伍带到那边去吧。”他指向左前方的一个山影。我想：那边没有打枪，不晓得有没有敌人，何况我们不能改变上级的命令。这时，我恍然大悟：一定是他故意把队伍停下来的！因此，我立刻叫一个战士跑步向前面联络，回头对连长说：“不行，不能改变方向。”连长哼了一声，没有搭腔。

这时，我对连长有了更大的怀疑，便一闪身，到后边找到几个支委和排长，把情况告诉了他们，悄悄地叮嘱说：“掌握好部队，听我的命令。”经过残酷斗争锻炼的共产党员和战士，革命警惕性是十分高的，所以大家很快就明白了可能要发生什么事情。

我再回到前面去时，在黑暗中发觉队伍零乱了，人也少了，连长也不见了。“糟糕！事情发生了！他已经拖队伍跑了！一定是向他说的方向去了！”我这样想，连忙告诉三排长，叫他带七、八两个班向左前方的山影快追。编班时，支部决定特别加强了两个班，以便在紧急时使用。三排长就带着这两班人，像老游击队员一样，一阵风似的向指定的方向奔去。我也立即带上其余的队伍跑步跟上。另外，又叫一个战士告诉后面部队：十一连出了事，要他们赶快向前找部队。

约莫走了三十分钟，忽然，前面的黑暗里有人喊：“哪里的队伍？停止！”是三排长的声音。我知道三排长已经追上了。我命令部队把叛徒包围起来，并向对方喊：“不要打枪，是自己的队伍。”叛徒还未走出红军的范围，在慌乱与恐怖中没敢打枪。

结果，连长和一、二排排长这三个叛徒全被捉住了。这时，听到远远的地里，有操着长沙口音的人在喊：“快来救我！”跑去一看，原来是刘玉海，他满身是血，慢慢地对我说：“政治委员，你去三排后，不知连长和什么人说：‘快点收伞！’一说这话，就有些人向前走动。我知道这话有问题，也跟去了。在路上他塞给那个向导几块银洋，要他往那山上带。我紧跟在后边。起初他对我说去找部队，谁知他猛一回头就把我的枪夺了，骂我是无义之徒，叛了洪门，捅了我两刀。他还大声嚷叫：‘跟我去有钱花，有官做；谁不跟我去，就打死谁！’之后我就昏过去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醒过来的。”刘玉海的话证实了张有发的叛变行为。

这时才发觉前方的枪声稀疏了，部队撤出战斗。我们撤下七八里路，天就发亮了。我带几个战士，亲自把三个叛徒押到师部，把刘玉海也抬去了。师长、政委听了我的报告后，立即决定把首犯当场枪毙，两个排长交政治部特务连看管。

事后，三排长升任为副连长。队伍到达宿营地后，师政治部指示：长沙来的战士中，谁不愿干红军的，就领路费回家。可是这些战士都觉悟了，除了张有发的表弟张德领路费回家外，没有第二个人肯走。

方强 出生于1912年，湖南平江人。文中身份为红3军团第5军3师7团11连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海军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2012年逝世。

攻克天津——突破护城河（油画） 秦文清作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新年抒怀

■杨志学

为了告别，也为了相见
为了一个握手
我们等了三百六十五天

不惧汹涌，也接纳平坦
一路走来风景频换
看见了大海，翻过了高山

明天在心里，今天在手里
无论希望号还是探索号
脚下都是无限辽阔的地平线

祖国是大船，个人是零件
不怕微不足道，不言蜡炬泪干
不负韶华，把奋斗的姿态留在人间

年夜图

■谢克强

1935年春节，中央红军在扎西的大雪中度过。

——题 记

呵，除夕夜
大朵大朵的雪花漫天飘着
欲将一个鸡鸣三省的小镇
雪封起来
年，能封得住吗
这支从腊月遵义走来的队伍
不仅突破年关的封锁
还用贺年的鼓声与鞭炮，点燃灶火

这不，额头纠结的丝丝烦忧
草鞋贮得满满的疲惫
枪刺上闪烁的警惕
以及离家越来越远的乡愁
统统都盛放锅里，然后
蒸酿成酒
不远处，指挥员坐在桌前
跳跃的灯火与灶火
交相辉映他凝神的身影
投在摊开的地图上，摊开他
越沉越重的心事

灶火越烧越旺，照亮年夜
而锅里越蒸越浓的年味
正穿过雪花随风飘落的记忆
飘向远方

高原在上

■静 叶

阳光在上，蓝天在上
星月在上，白天黑夜在上
风声雪声在上，白云黑云
还有带着冰和雪的云
以及越来越稀薄的空气
都高高在上，属于高原的
苍鹰和飞沙走石在上

我在高原，高原又削弱了一截
高原必须低下头颅，接纳我
深深浅浅的脚印，带着血丝的呐喊
以及短促的呼吸，还有携行携带的
誓言、枪弹、嘱托、思念和爱情
以及曾经的胆怯，还有代你未圆的梦

我在高原。高原高高在上的气焰
又矮了一截。那些在高原之上的征服
被大片大片的雪花湮灭，又被狂风
大口大口地吹走，再被
大粒大粒的飞沙走石埋藏
我埋藏了低处行走，攀上高原的头颅
虽然心还在颤抖，脚步还很沉重
但是我不会说出口

文学作品

长征

第4729期

社址 北京阜外大街34号 电报挂号 6043 邮政编码 100832 查询电话 66720114 发行科电话 68586350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0170号 广告部电话 66720766 月定价 20.80元 零售 每份0.80元 昨日（北京版）开印3时45分 印完5时05分